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史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 大事记
列宁主义 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专题参考 辞典

您的位置：首页 - 毛泽东思想研究

石仲泉：新中国60年与毛泽东哲学（2）

2009-9-14 9:44:51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二、新中国60年：毛泽东哲学的丰碑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内容的系统性看，毛泽东思想也可以称作“毛泽东思想体系”。实际上，我们党关于重大历史问题的第一个《决议》，原稿使用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提法。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也是从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的角度讲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体系，开始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前，最终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等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充实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体系。进一步来说，不仅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也是毛泽东哲学。新中国6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胜利，也是它们共同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哲学的丰碑。

毛泽东哲学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中的3个基本思想，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新中国60年的辉煌作出根本性指导。

（一）实事求是思想是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的辩证唯物论基础

毛泽东作出的一大理论贡献就是，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实事求是”因而成为毛泽东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它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新中国60年的历史发展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基本经验。

建国后的最初8年，在总的方面，我们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顺利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反右派斗争以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逐渐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走到“左”的极端。在近20年间，整个政治局面处于混乱的状态，整个经济情况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状态[2-2]。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少提高[2-3]。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又经历两年徘徊。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2-4]

改革开放的30年，是高扬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的30年。

一是实事求是思想被正式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毛泽东倡导

的，但明确地讲是党的思想路线，是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8]十二大的新党章基本沿用这个表述，只是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此后的历届党章讲党的思想路线，都沿袭十二大党章的提法。邓小平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的精髓，统统归结为“实事求是”，而且强调“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2-5]，从而将实事求是的思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是实事求是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之源。实事求是被明确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之后，就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根本点。过去，我们党曾经教条式地理解马列著作的某些观点，难以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国情。而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长期实践得出的这个基本结论，我们党作出并坚持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五大又加以丰富。十七大继续强调：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我们党创立的“一国两制”构想，也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这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实事求是[2-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仅这两个理论直接源于实事求是思想，其他许多理论也是根植于这个基本思想。

三是实事求是思想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开始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转变历程。对内改革从农村开始。邓小平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村问题，首先在农村搞责任制，给农民自主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农村的面貌就改变了。在此基础上，把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2-7]。对外开放是从学习外国的经验开始的。邓小平对出访的领导人说：详细地作调查研究，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理的。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办我们自己的经济特区。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体系。只经过20多年，我国就从闭关自守的贸易弱国一跃成为名列前茅的世界经贸大国。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2-8]

（二）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是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的唯物辩证法基础

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毛泽东深刻地论述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并且将这个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他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推进了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后来发生“左”的错误，也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据此制定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发生历史性巨变。

统一战线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而统一战线正确与否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建国后的最初8年，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尽管有时在有的问题上有些偏颇，但没有发生大的偏差，还创造出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成功经验。为了解决过急、过快、过粗、过纯等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遗留的问题，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党的八大期间开始调整政策，随后发表了不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精妙宏论。毛泽东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3]。刘少奇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

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一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是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4]。周恩来说：主流是社会主义，搞一点私营的，可以帮助社会主义发展[5]。这样的认识，说明当时的思想是很解放的。但是，反右派斗争以后，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大逆转。此后20年的“左”，从哲学上说就是没有正确运用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片面强调斗争对抗、“你死我活”。开展“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就是急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哲学基础就是全面把握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将“斗争哲学”推向极致的错误。重新认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就不能夸大对立面斗争的无条件性和绝对性，也不能忽略对立面统一的相互依存性、贯通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将这种哲学关系运用到政治领域和政策层面，需要正确地把握两者之间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此基础上，科学地界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30年能够取得伟大成就，得益于此。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运筹帷幄，“照辩证法办事”，用对立统一思想全面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建构起政策制定的基础。

一是就社会政治制度而言，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如果不搞社会主义，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发展起来也不过是附庸国[2-9]。“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10]当然，我国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切合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能够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尽管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过破坏，但是，我们的制度将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一天天地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绝对做不到的[1-9]。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二是就发展生产力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而言，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许多共通之处。列宁有一段著名论述：“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6]邓小平的思想与列宁的认识一脉相承：发展生产力，要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11]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包括利用外国智力、引进外资技术、开办合资独资企业、建设经济特区等。在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特点的同时，“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2-12]。“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2-13]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分解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把相对属于普遍性的市场经济机制从资本主义这个特殊制度中剥离出来，使之与社会主义这个特殊制度相结合，为社会主义服务。由此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事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丰富和完善这个伟大的创造，不断破解世界近现代史上无数的政治家、理论家苦苦求索的这个社会经济难题。其理论价值，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俱增；其实践价值，将随着我国的持续发展而给出最好的诠释。

三是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而言，提出坚持社会主义为主体，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存在和发展。超越国情制定政策，企图建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犯“左”的错误的重要根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冷静地分析国情，认识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一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30年来，我国改革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优势、相互促进；在社会分配方面，与多种所有制结构相适应，不断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承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和剥削收入。实践证明，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政策。

（三）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思想是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的历史唯物论基础

毛泽东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且据此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然而，如毛泽东本人所说，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是另一回事。反右派斗争以后，他没有坚持这个思想，而是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忽略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发展、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哲学基础就是重新明确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重新认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思想，取得了两大突出成果：

一是从理论层面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讲到我们国家的历史经验，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2-14]。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1]。“什么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1]这个界定，纠正长期的偏颇思维定势，特别是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突出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使科学认识社会主义达到新的高度，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是从实践层面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论”主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则主要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这条基本路线是在改革开放之中提出的，但它的初始思想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得到明确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尽管过去没有这样的提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党的八大决议已经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思想，在党的八大前后，已经产生许多好的想法。当然，在“前30年”，这两方面的思想没有坚持下来，更不会形成完整理念。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概括党的这条基本路线，并且称之为我们的主要经验。此后，历届党中央都不断强化它的意义。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党的十七大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任何时候都决不动摇。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说：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参考文献][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 第2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67[-1], 165[-2], 164[-3], 173[-4], 143[-5], 141[-6], 300[-7],

278[-8], 337[-9]. [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 第3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16[-1], 264[-2], 237[-3], 118[-4], 382[-5], 101[-6], 238~239[-7],

254[-8], 63[-9], 311[-10], 373[-11], 149[-12], 149~150[-13], 137[-14].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7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70.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刘少奇年谱: 下卷[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83.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中卷[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31. [6] 中共中央编译局. 列宁全集: 第34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170~171.

来源: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4期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 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